



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研究 ——基于大战略理论的视角

于思远, 顾 帅, 刘桂海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大战略为理论视角,提出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分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哲学、体育外交战略动力与体育外交战略部署3个模块。研究认为,三者之间关系可以由函数公式进行表达:战略部署(strategy deployment, SD)=战略哲学(strategy philosophy, SP)×战略动力(strategy motivation, SM)。其中,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哲学是基本系数,战略动力是自变量,战略部署是因变量。进而将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构建及其创新的实现路径具象化,厘清分支性研究领域,形成具有科学性、系统性、连续性、现实性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大战略;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深刻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自提出以来,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的建设便有序展开,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因此,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已刻不容缓,不仅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更能够为我国总体发展战略与外交布局提供实践支撑。目前,我国既有的体育外交战略研究对象通常围绕具象的战略决策展开,而鲜见对战略体系方向的探索。如果说体育外交战略决策是面朝实践的纲领性意见的集中体现,那么体育外交战略体系则是将实践经验规律化与科学化并内化国家政治意志而形成的宏观逻辑结构。总之,体育外交战略决策是体育外交战略体系的输出成果,前者具象而后者抽象,后者具有较为稳定的理论结构,因而能够超脱于时间,呈现出现实指导性与自我更新性。对体育外交战略体系抽象性的祛魅,将会赋予我国体育外交真正的战略意义,实现体育外交研究的全域性突破。

本研究认为,体育外交作为外交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战略体系的引入

能够将体育外交置于国家与国际背景下进行考察。当前,我国关于体育外交的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态势,但一系列的研究困境使得体育外交研究难以从低水平中蜕变。作为国际政治学、外交学、历史学、体育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对体育外交的研究理应博采众长。基于此,本研究对我国既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引入大战略理论,梳理我国体育外交战略与我国总体发展战略及外交布局之间的互动关系,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革故鼎新我国体育外交整体研究格局。

1 我国体育外交研究现状、问题与大战略的理论意义

1.1 我国体育外交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在中国知网检索“体育外交”“体育对外交流”“体育对外援助”等关键词,发现学界关于体育外交的研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且2017年后的年均发表量达到10篇以上。由此可知,基于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全球化程度加深、体育强国的建设,我国体育外交研究的重要性亦不断提升。梳理文献发现,我

收稿日期:2020-11-09; 修订日期:2021-05-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TY023);华东师范大学未来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培育计划项目(WLKXJ202008)。

第一作者简介:于思远(1993-),男,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外交、体育哲学、体育史学,E-mail: yusiyuan_5@stu.ecnu.edu.cn。

国体育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尚处于较为初级状态。究其原因,认为学界对体育外交研究的本体意识有待增强,即对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的体育外交所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认识仍较为模糊,未能准确标定体育外交战略在我国总体发展战略中的位置。主要表现为下述4个问题。

1)研究意识的主体性缺失。在目前一些规划类的政策文件中关于体育外交战略的内容均有待进一步凸显体育外交的主体性,更侧重于将体育外交作为一个关键词加以运用。根本原因是我国学界关于体育外交战略体系研究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诚然,战略体系研究存在一定难度且需要历史铺垫,因而超脱对决策的关注而达到对体系的观察尚待研究途经。马冠楠等(2012)对体育外交战略概念与功用进行了初步的探析,钟秉枢(2019)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介入体育外交战略讨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研究的深入。但总体而言,学界距离战略体系的构建仍待大量的研究工作。若想赋予体育外交在我国总体发展战略中的主体性,便需要站到更宏观的视角进行更系统的思考,形成以科学的战略框架为体育外交领域划分出沟渠纵横,进而厘清研究的理论分支,实现体育外交主体性的清晰化。

2)研究视角的宏观性欠佳。整体而言,我国体育外交研究尚处起步阶段,研究开展表现出星点式状态。从横向看,体育外交史学研究常以时间周期入手,进行阶段性政策演变与历史经验的梳理,呈现出对史料的简单堆砌与问题的浅显分析;从纵向看,在将实践经验理论化的探索过程中多采用单一视角,如从“北京奥运会”“一带一路”等角度探索体育外交的价值、原则和路径。点穴式研究在前期整体研究贫薄之际辅助解决了当即的现实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渐次深入,以实用为导向的扫雷式开拓无益于对体育外交战略体系的设计,全局观的不足桎梏着学科升格。面对匮乏整束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需要实现从离散转向聚合。

3)研究内容的系统性薄弱。在体育外交史学研究中,由于史料的有限性及方法依赖性,使得诸多历史分期研究过度地讨论时代背景而弱化了对体育外交的关注,表现为相似的研究结果在不同历史时期映射。在体育外交原理研究中,不能超越对体育外交世界语言、跨文化、高影响力、低政治性等特点的探讨,研究切入点的高度重复使研究内容落入空洞而不成体系。对体育外交基础概念亦未形成共识性认同,储江(2009)认为,体育外交是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对外体育关系的总和;刘桂海等(2020)认为,体育外交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兼具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属性。上述研究中关于体育外交的概念均体现了国家意志的核心。也有学者将民众自发组织的体育外交亦包括在内,体现了国家意志与民间意愿的双重性,对

基础概念认知的不一致使得我国体育外交缺乏统领性研究标准,掣肘了学术合力的形成。

4)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不足。从国际关系等专业角度而言,一定程度上我国体育外交研究有待挖掘路径,暂未构筑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这不仅是由于学界对体育外交本质的认识尚浅,还因为研究缺少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近年,体育外交研究的方法创新意识萌发,王创业等(2020)较为新颖地引入了马克思·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于思远等(2018)引入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关系建构主义理论,试图赋予体育外交以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意义。方法与视角的创新不仅丰富了体育外交的研究,使之变得立体、全面,更使体育外交本质的阐发得以可能。

体育外交作为交叉型的学术领域,受到体育与外交的双重红利和规训,对体育外交的本质探索必须借助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和传播学等学科。若仅局限于以体育为支点的体育外交研究,将使体育外交研究流于浅易。本研究基于上述4个问题,认为我国体育外交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体育外交如何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与外交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对该核心问题的考量,研究以体育外交战略为视角,以大战略相关理论为引,试图从研究视角、方法、框架上进行突破。

1.2 大战略的概念、历史及核心思想

“战略”一词历史悠久,诞生于军事战争而具有古典主义色彩,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通常指战争的艺术,即指导战争全局的谋略(李景治等,2003)²⁰。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现代化席卷世界,现代战略学应运而生,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2004)⁸⁹⁻⁹⁰所著《战争论》的问世标志着现代战略学的诞生,指出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自此,战争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性质愈发清晰,伴随着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的成长,战略学开始广泛融入各个国家的总体设计。随着全球化将国家间矛盾从单一的军事对抗催化为经济一体化,国家间表现为竞合关系,“核平衡时代”的到来大大降低了全局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世界秩序转向多维度的战略博弈,现代战略学中的军事元素相对弱化,经济、文化、外交等元素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大战略”的概念逐渐形成。

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2010)在《战略论:间接路线》中指出,战术是把战略应用到较低的一个阶层中,同样的,战略也就是把大战略应用到较低的一个阶层中,所谓大战略的任务,就是协调和指导一个国家的一切力量,使其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美国战略家魏德迈(2003)将“大战略”定义为使用一切国家资源以达成国家政策所定目标的艺术和科学,认为在现有的复杂的世界

环境中,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政治、心理等因素之间的分界线几乎都已消灭,一种较宽广的战略观念对于生存是有所必要的。在大战略之中还衍生出了国际战略的概念,这是“战略”的内涵与外延由纯军事领域向国际政治领域拓展的结果。李景治等(2003)²³在《国际战略学》中对国际战略进行了界定,国际战略是主权国家在较长时期内参与国际竞争的总体方略,其主要表现形态是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

随着国家大战略的逐渐成熟,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目的的外交也愈发关键。对外政策、经济政策及古典意义上的军事战略组成了大战略统一概念下的3个方面(Schmidt, 1985)。不同国家根据国内与国际角色的定位采取个性化的大战略,如美国在“9·11”事件后奉行全球范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Gaddis, 2005);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秉持区域范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我国则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后由“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转变为“奋发有为”的外交战略(阎学通, 2016)。这些变化均源自大战略层面的整体转型。需要指出的是,大战略可以简明地界定为基于手段和目的两者间经过深思熟虑所呈现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但它从来就不是一门精确不移、刻板划一的科学,而是需要以灵活为关键,不断地重新审视和调整(Kennedy et al., 2004)。

1.3 大战略学对我国体育外交研究的理论意义

1) 研究方法的意义。克劳塞维茨(2004)²³在《战争论》中对其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也就是先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部分时更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体。”本研究在对体育外交战略体系的研究过程中,秉持相同的研究思路,首先将体育外交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战略下进行宏观把握与总体分析,在构建完整的战略体系基础上深入区分独立的各个战略要素,加以分别考察,由感性的经验上升为理性的认识。以期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思考体育外交本身,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案例分析或历史考察管中窥豹,进而深入研判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与我国大战略及体育外交实践的相互关系,研究彼此的构造与内在机理,呈现出对体育外交的体系性分析。

2) 研究视角的意义。随着全球化格局的深入与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日渐提高,体育外交在我国大战略体系中的重要性亦愈发凸显。约瑟夫·奈(2005)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让人们认清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不仅是物质的更是心理的,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本身的投射性,可以使外部行为者产生学习、效仿的诉求,从而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随着外交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空间由精英延伸至大众,公共外交应运而生,外交也因此成为将一国软实

力转化为国际领导力的转换器。体育本身是软实力的极佳载体,在这个核心功能的加成下,体育外交在国际政治中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兼具官方外交与公共外交双重属性的体育外交所能够分享的文化、价值观、制度的认同正逐步超越实力的威慑,同时作为政府外交的体育外交实现政治诚意信号交换的效果亦引起了世界的重视。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均建立起了体育外交战略文件与机构,可以说将体育外交上升至国家大战略视角下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因此,对于我国来说,超脱经验式体育外交研究,将之上升至具有理性的科学体系,即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迫在眉睫。

3) 战略框架构建的意义。如果说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处于国家战略金字塔的顶层,体育外交策略处于底部,体育外交战略则是处于中观的战略维度,承上启下地联结二者。根据上述对我国体育外交研究现状的分析,学界关于体育外交的研究囿于对底部层面的关注,未从整体性的战略结构分析体育外交,匮乏对体育外交在国家大战略结构中定位的思考造成了体育外交研究难以跨越理论“冻土层”。因此,引入大战略理论能够成为构思、论证和表述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的基本框架与有力工具,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设计出路线图。进而赋予体育外交一个稳定的战略系统,使我国体育外交的行动能够有章可循,保持理性的决策、整合的计划与连贯的模式,形成科学化的体育外交理论基石。

综上,基于大战略对战略要素的划分、战略学研究成果的启示以及我国体育外交战略诉求与现实问题,本研究试将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分为3个模块:“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哲学”作为体系的上层建筑,包括战略文化、战略思维与战略逻辑3个战略要素;“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动力”作为体系的自变量,包括国家利益与战略环境及由二者交互形成的战略目标所构成;“我国体育外交战略部署”作为体系的因变量,包括我国体育外交能力、战略价值、战略决策、战略路径、战略评估5个战略要素。通过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能够实现我国体育外交目标与能力的平衡,正如利德尔·哈特(2010)²⁷⁸所说:“要使战略能够获致成功,其最首要的要求,即为对于‘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有精密的‘计算’,使二者之间能够密切的‘配合’。”构建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体育外交战略体系有助于更加精确地分析我国体育外交长处与短板,破除学界只知体育外交有用,却不知何以有用、何时有用、何以运用的困境。

2 作为战略常量系数的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哲学

以战略眼光考察我国体育外交,能够从中提炼出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信息,形成具有广泛適切性的战略道

理。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哲学基于我国国情,是我国体育外交得以表现为当前样貌的根本原因。伴随着我国体育外交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与规律化、科学化进程,体育外交在我国战略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孕养中生成了中国特色的战略思维与战略逻辑,也因此形成了我国体育外交战略体系中稳定的上层建筑,即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哲学。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哲学作为一种认识论指导着体育外交战略部署,这一上层建筑具有的高度稳定性,使之成为整个体育外交战略体系的常量系数。

2.1 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文化

战略文化由美国学者 Snyder(1977)在《苏联的战略文化:有限核行为的含义》中提出,它是国家的战略共同体成员之间共同分享的构想、在某些条件下的情绪反应,以及习惯性的行为模式。文化对战略部署的影响是一个深层次且无处不在的因素,会长期且稳定地发挥作用。一国的外交战略文化深受其自身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具有传承性质,代代相传的认知与行为模式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国外交战略文化的性格与倾向,表现出战略习惯与观念的惯性。如美国政治文化的源头来自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文化,其内蕴的“上帝选民、天赋使命”以及新移民国家的自由主义联合体的潜在认知,时常将自身的价值体系作为国际通行价值体系,自视的优越性使其在国际上习惯干预别国的内政并进行文化输出;俄罗斯政治文化中具有世界主导国的现实主义大国意识,使其始终保有庞大的军事编制以维持相当的军事实力。

我国体育外交的战略文化源自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文化,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代,并在后世不断改造并延续至今。江忆恩认为中国存在着两种战略文化:一种是以和谐、协作为首要选择的孔孟之道的战略文化;另一种是进攻性的战略文化,两者密不可分(李景治等,2003)¹⁴⁶。事实上,每个国家的战略文化都存有合作性与冲突性的基因,只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意愿执两用中。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化天下主义模式,因为中国古代秩序观以“礼”为体现,强调道德修养与和谐,其核心理念就是“和合”文化。同时,中国自古有以“礼战”“慎战”“非战”“尚和”为体现的战争和平观的精神,老子有“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之论,孙子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之说。正如意大利学者卡尔利柯夫斯基所言:“《孙子兵法》不仅是一种战争理论,而且是一种和平理论”(许志功,2005)。可见中国的“战”只是手段,“和”才是根本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战略文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理论意义上的分水岭,早期主导的战略文化是战争不可避免,冲突是人类事务中的普遍现象,强

调斗争与革命(秦亚青,200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则转变为合作性的战略文化,1987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高频率地表达了我国始终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捍卫者。我国体育外交战略文化作为是民族文化与战略文化的延伸,承袭着我国战略文化历史,因而可知在新时代下我国体育外交的战略文化底色是合作性质的,作为中国特色国际主义价值观核心意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的话语核心。

2.2 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的战略逻辑

战略逻辑生成于战略文化与历史经验,体现在无论国家利益、内部发展与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都保持着相同的战略理想与战略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战略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尽管各自具有时代特点,但总体上前后一以贯之,正如牛军(2010)指出,中共的领导核心是由一批有着共同理想的政治精英所组成的,他们长期保持着高度统一的思想 and 统一的意志,甚至有着相同或类似的政治性格。

尽管我国学界关于体育外交战略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但追溯我国早期的体育外交实践便可发现对战略逻辑的恪守与坚持。罗时铭(2015)认为,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战略重心可归纳为初期的政治战略重心,向后来的经济战略重心迁移,再向文化战略重心迁移,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外交对外实践发展始终保持着前后一致的历史脉络,无论在何种的外部条件下均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构成了我国体育外交的战略逻辑;始终坚持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国家外交总体布局与体育强国进程。从“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到“一条线、一大片”“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再到如今的“奋发有为”,体育外交在不同宏观外交战略布局中围绕不同的战略目标调整自身微观战略部署。可以说,我国体育外交的战略逻辑既是中国特色体育外交体系的重要特征,也明晰了实践方向。

2.3 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的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体(个人或集团)对事关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谋划(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杨洁勉,2014)。如果说战略文化源自民族性格,战略逻辑源自历史积淀,那么战略思维则是国家主体当下的认知模式,战略思维的成熟与否决定了一国能否明晰国家利益并认清国际形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体育外交迅速确立了党中央关于世界形势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判断。即使目前的国际格局新形势

揭露了全球化长期处于经济单引擎驱动的状态,以及政治与文化全球化的不成熟,但是全球化仍保持着总体向善的动力。因此,对和平与发展的认同应当作为我国体育外交的基本战略思维。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表明了我国外交战略宗旨立足于国际视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以国内与国际协同发展为己任,稳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此,面对新时代的诸多挑战,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应当坚持遵循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维,力求自领域的不断创新成长,将之注入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决策与路径制定之中。同时,杨洁勉(2014)认为,我国外交要重视非传统的“低政治”外交集中统筹,运用综合外交手段实现外交目标。这既为体育外交战略构建提供了良好条件,亦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当前不确定性的全球格局中,需要着重加强体育外交理论体系创新建设的力度与体育外交实践能力的水平,以更加进取、务实与高效的战略姿态融入我国总体外交布局之中,挖掘并夯实我国体育外交的核心竞争力。

3 作为战略自变量的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动力分析

美国著名战略学家Luttwak(1979)提出大战略的根本目标应当具备优秀的战略性素质,即合理、明确、集中、有限和内在平衡。事实上,战略目标的确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创造性工程,需要对作为自变量的国家利益与战略环境进行准确的认知与评估,这需要掌握大量准确的信息,并作出理性决策,制定连贯持续的长期战略计划,将成熟的理性观念嵌入体育外交的实践中。两种战略动力互涉,推演出体育外交战略具体目标,进而指导着体育外交战略部署的具体内容。其中,国家利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尽管有不同阶段利益的重心倾斜,但在长时间内保持锚定,且核心的国家利益始终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展开。战略环境则时常变动,是体育外交战略体系中最敏感的部分,也是引起我国体育外交战略部署调整的主要动力源。需要指出的是,检验我国体育外交战略部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是对战略环境判断力、反应力与适应力的良莠。

3.1 国家利益与我国体育外交

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是制定和实施体育外交战略的依据和根本导向,通常由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所构成,三个利益相互联系、影响与制约。

我国的安全利益分为传统安全利益与非传统安全利益。传统安全利益主要由地缘政治利益与国际话语权构成,具体为周边安全以及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领导

权。非传统安全利益主要由全球危机构成,包括恐怖主义、生态环境、网络安全等因素。我国的政治利益围绕国家主权展开,包括独立自主的民族自决权、和平共处的交往权、公平正义的发展权等因素。我国的经济利益主要围绕良好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展开,包括对外开放环境、平等的贸易环境、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等。

国家利益作为最基本的战略动力,构成了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国家大战略)的内核,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每5年的规划纲要便是对国家战略意图和政府工作重点的总结、调整与再确认,明确了我国具体的国家利益,规定了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的总体方向。目前,我国体育外交战略部署均会根据国家每5年的规划纲要针对性地设计体育事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将国家利益与体育外交深入结合并细化为战略决策,呈现出专业化的指导意见,较好地保证了我国体育外交实践的战略效果。

3.2 战略环境与我国体育外交

战略环境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且对战略环境的分析具有长期性与连贯性,进而保持着体育外交战略部署的前沿性与主动性。战略环境通常从客观环境、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政治环境3个角度出发,并最终形成整体性的战略环境判断。

在客观环境中,包括对经济、生态、科技等方面进行分析。如核均衡的状态促成了军事相对均衡环境,进而为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条件;互联网的全球普及使得地缘性民族社会的分界线逐渐被打破;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危机使得国家之间必须逐步超越地区性认同的鸿沟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冠疫情的暴发则带来了全新的客观环境变化,风险社会的全球打击对体育外交的影响亟需进行深入判断。

在国内政治环境中,需要重点把握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特点。审视我国的历史,改革开放确立了我国国内政治环境由过去的政治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重心,对体育外交战略部署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内政治环境正在由过去侧重于经济层面的发展转变为综合性的全面发展,对体育外交战略部署的调整相应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则需要理性判断我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回望历史,1969年2月19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国际形势座谈会上对当时的战略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作出了关于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判断的4份报告,形成了与当时党的九大报告截然相反的判断(陈少铭,2008),为1971年“乒乓外交”奠定了战略基础,进而实现了我国对美战略关系的破局。无疑,“崛起大国”已经成了世界对当前我国国际角色的共识,但我国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体育外交学界应对战略环境进行迅速、深入、持续的判断,与时俱进地调整体育外交战略目标,进而配合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维护健康和平的内外环境。

3.3 战略目标的生成与体育外交

作为战略动力的组成部分,国家利益与战略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我国的长期、中期与短期战略目标,从而对我国体育外交战略部署提出了具体的方向与要求。以澳大利亚为例,其体育外交战略明确服务于其前总理Kevin Rudd在2008年确立的澳大利亚要成为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的战略目标,并颁布了《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Australian Sports Diplomacy Strategy 2015—2018)、《体育强国2030》(Sport Diplomacy 2030)等指导文件,对其战略部署作了细致、清晰的说明与解释(张建会等,2020)。目前,我国外交战略由“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转变为“奋发有为”,这要求外交的总体战略目标由创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转向塑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阎学通,2017)。

在我国总体战略目标发生转变的基础上,我国体育外交应及时更新战略认识,对各个时间维度的战略目标进行调整。其中,长期战略目标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塑造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格局而展开;中期战略目标围绕提高我国国家软实力、塑造我国国际话语权、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等我国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全球发展、东亚地区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展开;由于短期战略目标受制于战略环境的频繁变动,其具体战略方向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如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格局走向、中美与中俄等大国关系的稳定性、东亚地区的政局变动等均须谨慎考量,因此,本研究对此暂时不进行论述,未来将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当前形势下的具体战略目标与我国体育外交战略部署的具体内容。

4 作为战略因变量的我国体育外交战略部署分析

我国体育外交的战略部署,由体育外交的战略能力、战略决策、战略价值、战略路径与战略效果组成。体育外交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坚持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哲学的认识论,另一方面受到战略动力作为自变量的影响,因此,可以将体育外交战略部署视作因变量。战略动力所形成的战略目标经过我国自身体育外交能力的加工与赋值,形成体育外交战略目标,表达为体育外交的战略决策与战略价值,进入战略阶段,体育外交生成于体育与政治在理论及实践的结合,是对国家间互动的专业化开发与改造(Murray et al., 2014)。作为实施策略环节的战略路径则将战略决策与战略价值具象化与操作化,形成对体育外交实践的微观指导。作为最终环节的战略效果则是对战略路径实施效果的反思与总结,形成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经验反馈回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形成结构

化的体系闭环。总之,战略部署的深层要义是将成熟的理性嵌入体育外交的实践中,即谋取目标与手段之间适切的配合,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4.1 我国体育外交战略能力审视

毋庸置疑,每个国家的体育外交均各有优势与劣势,对我国体育外交战略能力进行判断方能有的放矢地将战略目标现实化。对我国外交能力的判断可以通过以下方面进行系统定性与定量分析:1)我国国际体育组织基础人员与官员的占比;2)我国体育智库的国际化程度;3)我国竞技体育的区域与全球水平;4)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规模与方式;5)双边与多边体育对外交流的成熟度与分布;6)我国体育外交从业人员的数量与专业化能力;7)我国体育国际媒体的数量与传播权比例等。

目前,我国已具有一定的体育外交能力,但仍落后于欧美国家。我国体育外交能力的优势在于物质资源已经较为丰沛,体育工业化与产业化较好的发展水平保证了我国展开体育对外援助、举办国内大型赛事、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方面的基本盘。同时,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领导力、制度性公共产品以及我国体育外交专业能力的薄弱,使得我国体育外交的整体战略资源仍较为有限,制约了我国体育外交在高影响力附加值活动方面的表现。最终,战略动力所形成的战略目标经过我国体育外交能力赋值化后,合成体育外交战略目标,对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决策、战略价值、战略路径提出了具体要求与发展方向。

4.2 我国体育外交战略价值判断

战略目标在经过我国体育外交能力的赋值与过滤后所形成的体育外交战略目标,可以被我国体育外交战略部署模块进一步处理。下一环节便须确定体育外交具有哪些战略价值用以实现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目标。

研究认为,作为我国总体外交的“先行官”,体育外交的首要战略价值便是实现主体间的战略信号表达与交换。战略信号表达的概念源自国际政治心理学,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2017)在《信号与欺骗》中详细地论述了外交作为战略信号表达场域的运行逻辑,并指出了主体间对彼此战略信号的误判,即产生错误知觉是导致冲突与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体育外交在我国历史上已经多次证明了自身在交换诚意信号真实性与高效性方面的能力。其次,体育外交是国际间双边与多边关系的载体。作为大国关系的晴雨表,体育外交因其低成本与非正式性,营造了国家间交往的“安全沙箱”,体育外交也因此成为国际间双边与多边关系的“保险丝”。最后,体育外交能够塑造国家形象。竞技场的表现、运动员的个人魅力、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力等均体现了国家的价值观、制度、文化等特征。

体育外交的战略价值不止于上文所述,且不同战略价值在具体的体育外交微观目标的指引下亦呈现出不同的

内容。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体育外交战略价值的研究不能止步于浅显的功能论,应当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符号学与管理学等方面对运行机制进行科学化梳理,进而真正掌握体育外交的“使用说明书”,发挥超越“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价值(Cain, 2009)。

4.3 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决策制定

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决策是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主要的战略成果体现,通常形式是相关政策或文件,其凝结了我国大战略意志的指导性表达,如《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关于体育外事工作的指导意见。

战略决策一般以短句的方式进行表达,其中主语是战略实施主体,通常指代我国或我国政府单位(一般情况下会省略);谓语体现着对战略目标的具体态度;宾语则由战略对象构成;偶尔会有状语出现,表达战略态度的修饰或限制。如《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对体育外交战略决策的论述:加强对外体育交往,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中,主语被省略,“对外体育交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锚定了战略对象;“加强”“服务”明确了实践态度,二者共同构成了战略目标。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决策的具体内容较为简短,便于理解。但同时较为宽泛,需要进一步的阐释方能真正转化为体育外交的实践指导,如此便形成了后一环节——体育外交战略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我国每5年发布的体育事业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指导文件中,对体育外交战略决策的表达均未能有效凸显对不同历史时期针对性部署。如《体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表达为:积极开展对外体育交流与合作。《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表达为:扩大对外体育交流与合作。《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表达为:进一步扩大对外体育交流与合作。比较3个“五年计划”的体育外交战略决策内容,发现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目标高度相似,具体的战略态度调整没有本质性区分。本研究认为,体育外交战略决策应当适当加入更多的状语成分以凸显对不同历史时期特征的判断与说明,如在维护稳定的体育对外交往格局的基础上有序拓展;秉持底线意识,有原则地推动与重点国家的体育交流合作,助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

4.4 我国体育外交战略路径规划

我国体育外交战略路径可以被理解为具体策略,与体育外交战略决策形成战略与战术两个维度的内容。战略路径的环节分为两大内容,一方面是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决策的实施细节,体现出对具体战略目标的实施方法;另一方面则包括我国体育外交能力短板的改进意见,形成针对性的补足指导。

战略路径一般与战略决策同时形成,并体现在政策文件中。《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将具体的战略路径表达为:

构建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加强与重点国家和地区体育交流合作、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并对具体的实施方法进行了较细致的说明。在我国政策文件中所体现出的战略路径是精炼后的文字表达,实际战略路径的内容具有复杂性,需要学界对战略路径进行深入解读并指导相关执行单位与人员开展操作层面的活动。同时,每一个新政策文件的颁布均代表着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目标的再定位,有助于我国体育外事工作及时校正方向,配合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外交总体布局与体育强国建设进程。

同样以《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为例分析我国既有战略路径表达,认为文本对体育外交主体性的彰显有待进一步加强,即更加充分地提炼体育外交的本质特征。可以发现在体育外交战略路径的表达中,体育外交更多被作为关键词囊括于“中外人文交流”“全方位外交布局”等话语体系,弱化了对体育外交自身战略路径的主体性表达。更多原因在于体育外交学界的理论自觉意识尚为薄弱,虽然我国体育外交在较长时间内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但对基本原理、实践操作、历史资料研究的不充分,使得前者未有效转化为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指南。而理论自觉是一个学科的永久性命题,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实现学界整体对体育外交理论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本研究认为,体育外交战略路径应当在战略决策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分类加以讨论,并在每次新文件制订时围绕相同的战略分类展开评估与调整。本研究试图将体育外交战略路径分为6个子模块:体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体育外交实践能力建设、体育对外援助开展、体育国际话语权建设、体育全球治理领导力提升、体育交流平台建设。通过对6种战略路径进行系统、连续的分析,能够使得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文件呈现出历史参照性与战略连贯性,进而提高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的理论深度与实践效果。

4.5 我国体育外交战略效果评估

战略决策与战略路径的最终呈现并不代表着整个战略体系的完结,作为我国体育外交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战略效果评估环节代表着反思与总结,反哺我国体育外交实践经验的规律化与科学化、我国体育外交能力赋值化这两个处理环节。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因此形成逻辑闭环,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科学战略体系。

虽然我国在体育对外援助、“乒乓外交”、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方面有一定的战略效果评估成果的产出,但并未形成机制化、常态化、标准化的体育外交战略效果评估模式,掣肘了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的创新动力。美国设有常态化的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对所实施的信息和交流项目进行调查、评估和监督,并形成年度报告(陈静静, 2019),不断改进或淘汰效果欠佳的项目或方式。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应当将战略效果评估环节视为整个战略体系的重点,体育外交只有不断自我审视与革

新,方能最大化地开发外交能力,提高在我国大战略体系中的定位,由简单的实践手段转变为富有竞争力的战略资源。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对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图1)的3个模块及各个战略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

结构化分析后,将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可视化,并呈现为战略体系函数公式:战略部署(strategy deployment, SD)=战略哲学(strategy philosophy, SP)×战略动机(strategy motivation, SM)。其中,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哲学是基本系数,战略动力是自变量,战略部署是因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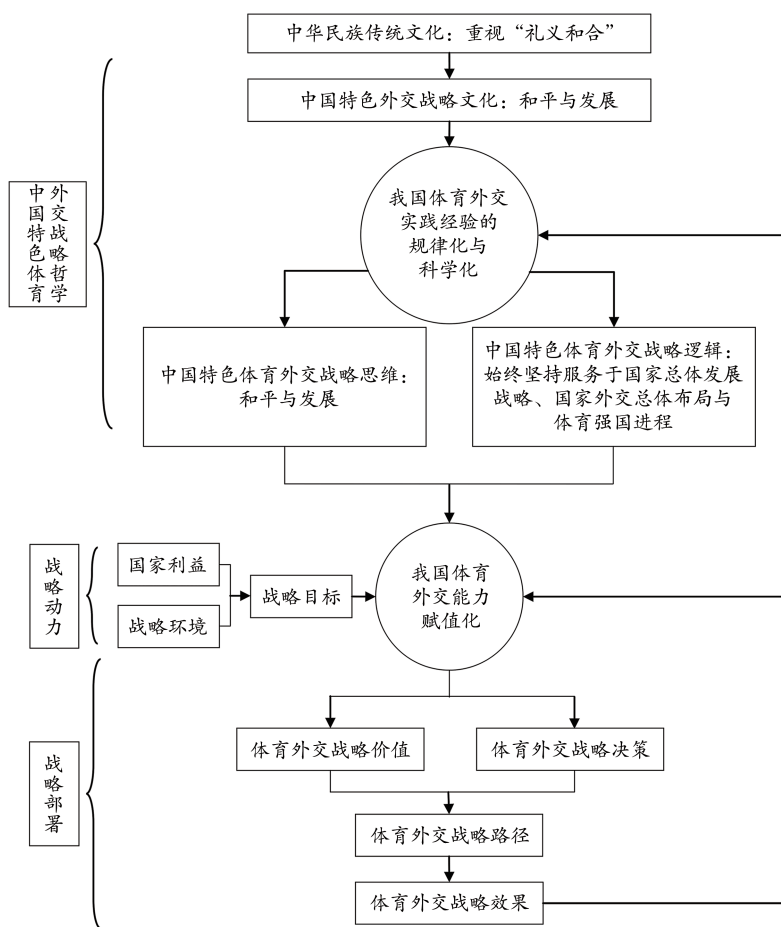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

Figure 1. Sports Diplomacy Strateg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注:方框表示主要元素,圆框表示处理环节,箭头表示逻辑关系。

5 结论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尚处于成长阶段的我国体育外交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夯实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保证体育外交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大战略的子系统,对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的构思与完善能够保证我国体育外交实践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而进行目标与能力相平衡的自我审视与不断创新,反之也是为了在实践中获得更好的效果。正如时殷弘(2005)所言,集中和内在平衡是关键,而其根本的内在基础是目的和手段之间高度合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之一,也是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一个复杂纷繁的战略体系不断成功的首要保障,在于战略上优秀的根本目标始终不渝的统帅地位。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是伴随着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产生和发

展的,是中华文明智慧在体育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

此外,体育外交的性质与绘画、音乐等艺术一样,一部分是机械化的,适合于理论研究,即研究所致力于呈现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另一部分则是环境化的,即实践过程中的创造性突破,受天才和经验的支配,如“乒乓外交”“奥运模式”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公共外交的日益成熟及国家对软实力的重视,体育外交亦具备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何挖掘与发挥体育外交的磅礴能量则需要学界紧跟时代步伐进行思考。尤其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冠疫情的肆虐、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冲突、东亚地区共同体建设的阻力,种种战略环境变化已经引起了新形势的出现,体育外交应当不断审视自身目标与路径,通过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及时校正方向,服务于我国总体发展战略与国家总体外交布局,助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 陈静静, 2019. 战后美国公共外交研究和评估机制研究(1945—2015)[J]. 公共外交季刊, (1): 7-15, 122.
- 陈少铭, 2008. 一九六九年“国际形势座谈会”及其历史贡献[J]. 中共党史研究, (1): 75-81.
- 储江, 2009. 论体育外交[J]. 体育文化导刊, (4): 6-9.
- 克劳塞维茨, 2004. 战争论[M].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 利德尔·哈特, 2010. 战略论: 间接路线[M]. 钮先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景治, 罗天虹, 2003. 国际战略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刘桂海, 汪婷, 杨智国, 等, 2020.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体育外交: 历程、经验与理论反思——基于“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三重视角的考察[J]. 体育科学, 40(3): 15-27.
- 罗伯特·杰维斯, 2017. 信号与欺骗[M]. 徐进,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罗时铭, 2015. 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史(1949—2008)[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 马冠楠, 刘桂海, 2012. 体育外交战略探析[J]. 体育文化导刊, (2): 1-5.
- 牛军, 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秦亚青, 2003. 国家身份, 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 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J]. 世界经济与政治, (1): 10-15.
- 时殷弘, 2005.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J]. 史学月刊, (6): 5-10.
- 王创业, 张德胜, 2020. 体育外交的实践逻辑: 工具理性与资本再生产[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44(5): 47-54.

- 许志功, 2005.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研究[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 阎学通, 2016. 超越韬光养晦[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阎学通, 2017. 外交转型、利益排序与大国崛起[J]. 战略决策研究, (3): 4-11.
- 杨洁勉, 2014. 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J]. 国际展望, (1): 1-13, 146.
- 于思远, 刘桂海, 2018. 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理论体系的探索[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52(1): 12-18.
- 约瑟夫·奈, 2005. 硬权力与软权力[M]. 门洪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建业, 钟秉枢, 2020.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 经验与启示[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44(5): 55-62.
- 钟秉枢, 2019.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下的中国体育外交战略构建[J]. 体育文化导刊, (2): 15-21.
- CAIN J, 2009. Hoop Diplomacy[C]//2nd Hague Conference on Diplomacy. The Netherlands: The Hague.
- GADDIS J L, 2005. 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J]. Foreign Aff, 84(1): 2-15.
- KENNEDY P, GADDIS J L, et al., 2004. The Grand Strategy Project [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
- LUTTWAK E N, 1979.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M]. Baltimo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 MURRAY S, PIGMAN G A, 2014. Map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sport and diplomacy[J]. Sport Soc, 17(9): 1098-1118.
- SCHMIDT H, 1985. A Grand Strategy for the West[M].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J, 1977.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M]. Santa Monica: Rand.

The Sports Diplomac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rand Strategy Theory

YU Siyuan, GU Shuai, LIU Guihai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grand strategy a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s diplomacy strateg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modules: The sports diplomatic strategy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sports diplomacy and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China's sports diplomac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modules can be expressed by a functional formula: SD (strategy deployment)=SP (strategy philosophy)×SM (strategy motivation). Among them, the sports diplomacy strategy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basic coefficient, and the strategic motivation i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i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Furtherm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diplomacy strateg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its innovation are concretized. Branch research fields are clarified, and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continuous, and realistic research framework is formed.

Keywords: grand strateg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ports diplomacy; strategic system